

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

薛月順

摘要

鹿窟事件的爆發源頭為保密局在溫萬金家裡搜出了一份他在鹿窟基地受訓的筆記。然而，此為鹿窟事件的觸發因子，情治單位僅由此得知有個中共地下黨員的基地存在，直到汪枝被捕，才知道基地究竟在何方。表面上，從發現溫萬金的訓練筆記到汪枝落網是顯而易見的因素，但該事件之所以爆發，其來有自，不宜如此簡單歸結。

首先，經濟問題是當時基地迫切需解決者，正如陳本江所言，他們固定來自於高雄吳某守等人的財源中斷，因而不得不下山募款，要募款必須發展，於是埋下未來基地被破壞的種子。

其次是基地本身的問題，鹿窟基地發展至1952年，群眾對於玉桂嶺事件之後所實施的集體宣誓與血親連坐產生反感，再加上山上的生活不易，基本人員素質不一，彼此之間時有衝突，甚至為了爭權而分裂；領導者不僅以勞動訓練之名，讓他們從事砍柴、燒炭、農耕等勞作，還經常處於飢餓狀態，而且上級禁止本地男女結婚，自己又秘密地和本地婦女結婚，亦引起群眾憤怒，其內部不穩之態早已浮現。

再者，陳本江在鹿窟建立基地後，還向外擴展，但由於他們隱蔽於山區，所發展的群眾亦侷限於當地居民，山民世居，彼此之間不是親戚就是朋友，較不利於組織隱秘性的安全要求，因而有幾次險些被查獲。

最後，蔣中正退守臺灣的軍、政危機，因為韓戰之爆發而解除後，對內持續肅清潛伏臺灣的中共地下組織，對社會的控制力日益增強，使得局勢越來越不利於中共地下組織的發展，不但基地主要財源的募款越來越難以進行，而情治單

位偵查的觸角也日益延伸，不僅溫萬金和汪枝，其他鹿窟基地重要關係人，也可能難以避免在各種情形下被查獲，甚至被捕，進而供出基地內情，鹿窟事件的爆發，只是遲早的問題。

關鍵詞：溫萬金、汪枝、陳本江、保密局、鹿窟事件

Wen Wanji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Luku Base

Yueh-shuen Hsueh^{*}

Abstract

It has been commonly believed that the Luku Communist base was discovered by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Bureau because it found in Wen Wanjin's house a notebook he had kept during his training at Luku. However, that was only an ostensive clue that led to the break of the Luku case. The arrest of Wang Zhi, which allowed the Bureau to find out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ddition, there were many fundamental and longer-term developments that caused the demise of the Luku base.

First of all, money for the Luku base wa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its leader, Chen Benjiang, needed to solve. The poor financial situation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base to survive.

Secondly, life in the mountains was not easy. Members at the base were required to engage in "labor training" by cutting firewood, burning charcoal, farming and other works, but they were still kept on short commons. They were also dissatisfied with the collective oath and family implicated punishment that had been imposed upon them after the Yuguiling incident. Cadres were of uneven quality and qualifications, and there were often disputes or even power struggles among them. Moreover, the leaders forbade members to marry local women yet secretly doing so themselves, which angered the members. The base had already been in an unstable condition by 1952.

Thirdly, Chen Benjiang and his comrades thought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Luku was not secure enough and they had to expand outwards. However, local residents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in the mountains were a close community, which could not be easily penetra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Luku membes were almost spotted by the police.

Furthermore,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political establishment in Taiwan became much more secure after the Korean War, and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he island grew stronger.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ways for the intelligence-security network to remove domestic threats, and such situation made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Communist underground to operate. Wen Wanjin, Wang Zhi or someone else related to the Luku base would have inevitably been discovered and arrested, so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learned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base. These were the real reasons that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Luku base.

Keywords: Wen Wanjin, Wang Zhi, Chen Benjiang, Counterintelligence Bureau, Luku Incident

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

薛月順**

壹、前言

鹿窟事件起源於以陳本江為首的一群中共地下組織人員，因為身分暴露，無法再於平地活動，於1949年在陳春慶¹等人的引導下，陸續轉移到鹿窟山上藏身，他們在山上建立基地、發展群眾，並先後擴建玉桂嶺、海山以及瑞芳八分寮的「曉」²基地，直到1952年12月28日被突破為止。

* 本文初稿曾先後宣讀於「國史館110年度4月份修纂同仁學術討論會」（2021年4月29日）與國史館主辦之「解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2022年學術討論會」（2022年12月10日），分別承蒙與談人吳俊瑩協修、陳翠蓮教授及在場多位先進惠賜卓見；再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謹在此併表感謝之意。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4月7日。

** 國史館協修

¹ 陳春慶，臺北市人，朱厝崙公學校畢，為鹿窟村長陳啟旺的堂弟，引導陳本江等人進入鹿窟建立基地並發展群眾；國防部保密局包圍瑞芳曉基地時突圍成功，逃亡2年餘，於1955年7月1日在淡水被捕，除了方金澤下落不明之外，為鹿窟基地已知的基本人員中最後一名被捕者，時年33歲，其後在內政部調查局辦理自新。「陳春慶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5年7月），〈陳春慶〉，《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75295060。

² 曉基地為陳本江於1952年春才建立者。許再傳說：「曉」的名稱是李上甲取的，取其天亮的意思，是個掩護的代名詞。「許再傳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3年8月18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virtual001。

28日深夜，軍、警、特務包圍鹿窟周遭、汐止與石碇交界山區。次日，凡封鎖線內外出入人等均被扣押，可疑者解送菜廟（事件後改名為「光明禪寺」）集中處理。此事牽連甚廣，受難者人數眾多，拘捕行動不僅擴大到瑞芳、玉桂嶺與海山地區，且於事後追捕陳本江等首腦及陳春慶等漏網分子過程中，只要曾與他們有所接觸者皆受到影響，輕者被拘禁審問、重者喪失性命，少有倖免。³ 鹿窟事件可說是繼蔡孝乾「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案之後規模最大的「匪諜案」。

陳本江（1915-1967）為省工委會組織中的成員，本名陳大川，高雄大寮人。1930年初到廈門就學，七七事變後遷回臺灣，在庄役場（大寮鄉公所）服務2年後，於1940年負笈東京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43年冬到北平，不久即進入北京大學法學院任助教和講師，教授經濟史和日語。戰後於1946年8月在上海等待返臺、暫居臺灣同鄉會⁴時，經由藍明谷認識蔡孝乾。1946年10月返臺後，至1947年6月才加入共黨，地點就在基隆中學宿舍，直接受蔡孝乾領導。1949年8月18日林正亨被捕後，陳本江身分暴露，為躲避緝捕，逃到鹿窟；9月，開始在當地著手建立基地，⁵目的是為了配合中共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做準備，係基地上的「劉上級」。1950年1月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後，陳本江即未再回到平地

³ 與鹿窟事件直接相關的政治案件有：「蕭塗基等案」、「許希寬等叛亂案」、「周植叛亂案」、「許再傳等叛亂案」、「陳標等案」、「陳振福等叛亂案」、「江鳳等案」；其他因鹿窟案被供出或受牽連的受難者眾，已知有：「溫萬金等案」、「王忠賢案」、「李書勳等叛亂案」、「曾文隆等叛亂案」、「王精等叛亂案」、「吳某守等叛亂」、「曾維成等叛亂案」、「林勤案」、「周添壽等案」、「鍾興福等案」、「廖長琄等叛亂案」、「陳春英等叛亂案」、「辛維新等案」、「陳子胥等案」、「阮英明等案」……等，部分案件或多或少與省工委會案相關，其間的定義與界限尚待進一步釐清。

⁴ 上海臺灣同鄉會是由李偉光領導的省工委會駐滬交通聯絡站。「張志忠訊問筆錄」（1950年8月20日），〈蔡孝乾〉，《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蔡孝乾訊問筆錄」（1950年8月29日），〈蔡孝乾〉，《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

⁵ 陳本江於保密局的談話筆錄與自白書中，明確指出其於1949年9月起著手建立基地，同時在自傳中則說他係8月到鹿窟。「陳本江談話筆錄」（1954年6月13日），〈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2；「陳本江自傳」、「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臺北：國史館，2020年），頁730、749。

活動，全心留在鹿窟擴展群眾並從事組織訓練工作，直到基地被圍。⁶

溫萬金（1918-1955）在省工委會組織中的地位遠不如陳本江等人，1950年省工委會案發後，國防部保密局（以下簡稱保密局）層層追查省工委會「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所屬各支部，至1952年底才查到了溫萬金可能涉案。⁷ 谷正文甚至說他「對共產主義的瞭解及如何當一個優秀的地下工作人員，並無正確認識」。⁸

1952年11月27日保密局會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下簡稱保安司令部）前往逮捕時，溫萬金幸運脫逃，就此展開1年又4個多月的逃亡生活。之後，情治人員在他家裡搜出曾在某地受訓的筆記，由此推定，臺灣還有個共黨收容流浪成員，提供再訓練的處所。保密局就此全力追查，12月26日，汪枝⁹ 被逮捕，在保密局嚴刑逼供、軟硬兼施之下，全盤托出鹿窟基地實情，才使得鹿窟山上的秘密基地曝光，2天後，鹿窟事件就爆發了。

溫萬金只有公學校的學歷，他的妻子說他甚至連日本話都不太會講；中文程度也僅在二戰結束前，於迪化街的補習班學過漢語。¹⁰ 他之所以被情治人員視為重點追緝對象，係由於保密局上報國防部搜出溫萬金的受訓筆記後，國防部下令保密局會同保安司令部密捕並擴大偵辦，¹¹ 當局希望藉此偵破中共的地下訓練基

⁶ 陳本江於鹿窟基地被圍前半個月，即轉移到曉基地，1953年2月8日南下躲藏，1954年5月19日於鳳山向保密局自首。「陳本江自傳」，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事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694。

⁷ 「保密局致參謀總長報告」（1952年12月10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臺北：國史館，2020年），頁3。

⁸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獨家出版社，1995年），頁148。

⁹ 汪枝，臺北市人，1940年畢業於大龍峒國民學校，以修理輪胎為業，1946年5、6月間經由蔡朝宗介紹、陳義農吸收加入共黨，1952年2月與許希寬一起上鹿窟，5月開始擔任鹿窟基地之平地連絡員。1952年12月26日被捕，時年27歲，後於保密局辦理自新，並成為該局正式職員。「汪枝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6月8日），〈陳句煙〉，《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75292762。

¹⁰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頁188。

¹¹ 「國防部致保密局代電」（1952年12月26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21。

地，而他最後成為死刑犯被槍決，歸根究底，還是保密局在溫家找到了此一重要線索。本文目的在於經由溫萬金的個案，探討鹿窟事件爆發的原因。

其次，目前鹿窟事件之官方檔案或口述歷史，大多著墨於1952年底鹿窟被圍之後的發展，對於12月28日之前基地的狀況仍在霧中，本文試圖以溫萬金上山的背景及經歷，分析鹿窟基地本身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及被突破的因素。再者，當時的臺灣人，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如同溫萬金，逐漸傾向共產主義，而且相信中共將解放臺灣者，不在少數，但有關其左傾情形，可供研究的史料不足，本文第二節僅能從其交遊情形以及其他案件中，觀察其足跡與組織關係，第三節則分析他到鹿窟山上的緣由以及當時基地的狀況與背景，第四節說明他在山上的生活情形，以及無法適應而逃離，第五節再探討鹿窟事件爆發的原因，第六節敘述溫萬金之落網，並處理其自首主張未被承認的問題，以完整交待其經歷。

對於那些陳本江在平地所發展的直接或間接關係，因為身分暴露或其他各種機緣，於1949年8月之後到鹿窟山上者，均與陳本江在當地所發展出來的群眾或隊員有所不同，也與村民口中的「走山仔」意涵不完全相符，他們在官方檔案文件中多以「匪幹」或「戰鬥員」名之，陳本江稱之為「基本人員」，也有些鹿窟基地的指導員稱之為「基本幹部」，本文統一採用「基本人員」一詞，以其「集體宣誓詞」有言：「我們都是勇敢的而且是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我們能夠做保衛隊的最核心組織的一員（基本人員）。」¹²

貳、溫萬金之交遊與組織關係

溫萬金為臺北市人，1918年生，乳名加在，外號「一五五」、老蘇，「一五五」由其體重155（臺）斤而來；「老蘇」的由來是他在鹿窟時，眾人以為他有

¹² 「集體宣誓詞」（1952年3月7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1284。「匪幹」一詞通常出現在情治單位與上級的往來電文或報告中，而「戰鬥員」常見於訊問或偵訊筆錄中。

錢，好像很「蘇」，蘇字有潤氣之意，¹³ 因其為人和氣、個性慷慨，又同情生活困難的人，時常資助朋友。溫萬金畢業於老松國校，日治時期曾在廸化街一家與臺灣文化協會有些淵源的補習班學習漢語，做過電氣學徒、建築業剪鐵條工人，戰後自營電氣包工，在延平北路開設「民光電氣行」，承包電燈安裝等工程。他做生意乾脆，收費低廉，而當時社會上對於安裝電氣線路、裝設電燈方面的需求日增，工作應接不暇，因此店裡雇用了數名工人，家裡也住著幾名學徒幫忙，¹⁴ 由於承包的生意漸漸變多，收入漸增，經濟寬裕，二二八事件之後遷至錦州街，店面兼住家和倉庫。¹⁵

溫萬金之所以涉案，從檔案史料來看，可追溯至蔡孝乾之省工委會案。省工委會於二二八事件之後至1948年5月間，在臺北市發展了「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臺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等組織，下轄「郵電職工總支部」等10餘個支部，黨員163名。¹⁶ 根據官方的資料記載，溫萬金之「電器（氣）工人支部」為「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所管轄，保密局逮捕簡吉等人，於獲案資料中發現線索，聲稱破獲臺北市工作委員會三重埔、電氣工人、泥水匠等三個支部，會同保安司令部搜捕相關人等，1952年11月27日逮捕溫萬金的行動僅為其中之一。¹⁷

¹³ 呂赫若在鹿窟基地化姓「蘇」，因此1950年9月3日之前，「老蘇」通常指的是呂赫若。另據偵訊筆錄中所載，溫萬金於1954年3月30日落網時年36歲，推算其生年為1918年。「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筆錄」（1955年1月12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⁴ 當時在民光電氣行工作的學徒及工人，可能至少有：方萬土、徐火炎、陳隆盛、陳文卿、張金海、高逸人、王金朝等數人。「方萬土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6月8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⁵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91。

¹⁶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0卷第1期（2009年3月），頁403。

¹⁷ 三重埔支部案計逮捕李秋金、黃火成、曾昭沐、陳其章、黃土焜、黃西城、陳文卿、黃宗國〔按：黃崇國之筆誤〕、李來園、李鐘瑞、李添才；電器工人支部案計逮捕陳德、陳為政、廖崑洽、林丙丁；泥水匠支部案逮捕周植義。以上三支部案共計16名，其中陳文卿為溫萬金之姻親，陳為政、林丙丁與周植義，均與溫萬金有關係，後來併入「廖長琨案」被判刑。「破獲臺市委下層組織名單」，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8。另外，1953年6月保密局將黃崇國移送保安司令部軍法審判，以及同年7月保安司令部起訴他的理由，皆因其參加「愛國自治同盟」，與陳文卿、

溫萬金參與中共地下組織活動，而且至死堅信解放軍遲早會來臺灣，¹⁸ 可是相關資料欠缺，難以明瞭其思想脈絡，本節僅就所得資料，試圖說明其經歷以及參與中共地下組織的情形。另外，保密局最後將溫萬金移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的理由，是溫萬金「參加叛亂組織，為匪活動，並負責供給匪武裝基地經費，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並在「供述要點」中記載他：經由王忠賢介紹加入共黨，先後受廖瑞發¹⁹、孫古平的領導，與王忠賢、陳義農、陳焰樹²⁰ 同一小組。²¹ 保安司令部的判決書也說他：「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由王忠賢吸收加入匪幫組織、閱讀匪幫書刊。」²² 這些記載虛實夾雜，但能反映他與王忠賢等人的交往及其左傾傾向。本節先分析溫萬金的交遊情形，再說明其組織關係。

李來園同一小組，受張金海領導，未再提及其參加三重埔支部之事。「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3年6月25日）、「保安司令部起訴書」（1953年7月28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⁸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勳母子訪問紀錄〉，頁197。

¹⁹ 廖瑞發（1910-1950），臺北蘆洲人，1910年生，日治時期加入臺灣共產黨，1931年被捕入獄，並被判刑2年。戰後於1947年經由王萬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蔡孝乾由中國返臺組織省工委會時的早期成員之一，1949年因為李中志被捕後供出他是共產黨員，10月11日被捕，隔年7月2日，與李中志一起被槍決於馬場町刑場。「廖瑞發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0年5月16日），〈廖瑞發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563。

²⁰ 陳焰樹，宜蘭人，為公路局司機，與潘溪圳、周生發同為司機工會成員，1949年8月21日上鹿窟。1952年底鹿窟基地被圍時，雖與方金澤、王忠賢、廖紅柑一起突圍成功，但於1953年4月28日出面向保密局自首，時年38歲。「陳焰樹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7月11日），〈周添壽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21。

²¹ 「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4年10月5日）、「溫萬金等七名供述要點」，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597-600。

²² 〈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一、溫萬金的交遊情形

（一）王忠賢

王忠賢，臺北市人，大安國校畢，以泥水工為業，1946年春由廖瑞發介紹加入共黨，並在其領導下，吸收黨員，發展臺北市工作委員會組織，二二八事件時在景美地區活動，1947年底參與臺北市工人工作委員會組織，從事工人運動，亦與陳義農交好。1949年11月間，因為潘溪圳（化名黃樹木，當時任職於宜蘭東臺木材行，負責測量木頭）的關係，藏匿於宜蘭松羅坑工寮，化名翁阿番，後在海山、景美等地躲藏，1951年12月上鹿窟基地，化名老葉。1952年春，曾與李上甲在海山基地發展組織。鹿窟基地被圍時，與方金澤、陳焰樹、陳廖紅柑一同突圍成功，後潛返北市近郊，以捕魚、做泥水工維生，至1954年3月10日被捕，時年41歲；最後被判處死刑，1959年2月18日槍決。²³

王忠賢從事泥水工，溫萬金賴以謀生的安裝電氣工程常需要泥作，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兩人在工作和私交上即常有往來，彼此互相介紹生意。溫萬金喜歡研究理論，常在臺北市的書店、書攤上購買與閱讀當局所謂的「反動書刊」，王忠賢會拿一些《光明報》、《群眾》、《時與文》、《烽火》等書刊給他看。²⁴ 1945年11月王忠賢介紹他和周植²⁵ 在大稻埕的靜修女中教室裡參加臺灣人民協會。該協會係謝雪紅於1945年10月5日創立於臺中，欲延續昔日臺灣共產黨在日治時期的理念路線，同年11月17日成立臺北分會，隔天，由臺北分會主辦之演講活動在永樂座劇場召開，此一活動稱為「民眾大會」。溫萬金所參加者為臺北分會第二次大型籌備會，那一次謝雪紅亦北上與會。²⁶ 據溫萬金描述，當天有3、

²³ 「王忠賢供詞摘要」，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581；「王忠賢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4年10月9日），〈鍾興福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7/276.11/8211.2/virtual002。

²⁴ 「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筆錄」（1955年1月12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²⁵ 周植（1913-1955），臺北市人，1952年12月2日上鹿窟，1953年1月6日鹿窟被圍時被捕，後被判處死刑，1955年2月23日處決。〈周植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49。

²⁶ 謝雪紅為了臺北分會的成立，由臺中北上三次，第一次帶楊克煌、王天強、李喬松等，在雙連

400人參加，還有新聞記者和政府人員在場，他之後還去聽了幾場演講。²⁷ 次年1月10日臺灣人民協會等左翼團體即被陳儀依據《臺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下令解散。

王忠賢不僅是溫萬金工作上的伙伴，也一起參加共黨活動，例如他們於二二八事件後的1947年4月至觀音山討論組織游擊隊之事、6月至嘉義與張志忠會面等。²⁸ 保密局利用他們兩人的交情，當溫萬金被拘押，偵訊工作不順利時，特意將王忠賢遷到同一間牢房，通過王忠賢的遊說，同時以令其辦理自首為餌，使得溫萬金攀咬出於其逃亡期間提供幫助的廖水泉和陳泗海二人，說曾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好處，不久就要來解放臺灣。此事令溫萬金後悔不已，被冤枉，也冤枉人，保密局還是未讓他辦理自首手續。由於保密局不承認他的自首主張，刑求又攀罪於他，使他感受含冤莫白的委屈。²⁹

（二）陳義農及其他人士

與溫萬金交好的共黨黨員，除了王忠賢之外，還有陳義農。

陳義農（1907-1955），臺北市人，以木工為業，在鹿窟事件的基本人員中，年紀最長。他於日治時期常聽臺灣文化協會蔣渭水、蔡培火等人的演講，對於貧窮子弟付出勞力卻工資微薄的現象不平，但當時還不認識共產主義，只因為

碑的黃江連家參加第一次籌備會，第二次北上是為了在大稻埕靜修女中召開的第二次大型籌備會，第三次是為了參加在永樂劇場由臺北支部主辦之演講活動。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年），頁585；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第37期（1994年1月），頁42。

²⁷ 據溫萬金的說法，臺灣人民協會的會長為陳慶南，在林森路開設雙連鐵工廠，他只是在他家裡聽演講，沒有所謂的小組組織，也不知道該會做什麼事。「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1月26日）、「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簡易審判庭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0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²⁸ 關於這兩次活動，溫萬金承認曾與王忠賢到過觀音山，但他說他只是去那裡掃墓，而非討論組織游擊隊；至於嘉義之行，保密局說他雖與張志忠見面，但因體胖，未參加自治聯軍的行動，即返回臺北。「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1月26日），〈溫萬金等〉，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virtual001/virtual015/0006；「溫萬金等七名供述要點」，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601。

²⁹ 「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5年1月17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蕭來福的關係而入獄。蕭來福為臺灣文化協會成員，教陳義農識字，1931年臺灣共產黨成員遭日警大舉搜捕，謝雪紅於6月被捕、蕭來福於7月被抓，半年後，陳義農亦受波及並被判刑2年入獄。他在獄中認識廖瑞發，思想受其影響頗深，其後於1946年4月中旬，亦由其介紹加入中共組織。³⁰

陳義農出獄後，廖瑞發時常介紹木工生意給他，又因為生意上的關係認識做水泥包工的王忠賢和周植、做電氣包工的溫萬金。許希寬³¹是陳義農的表弟，當時他與蔡朝宗、陳朝陽³²等人從學校畢業後就在陳義農那兒學習木工，學成後留在他的工廠做計件工。汪枝從事輪胎工，因為與蔡朝宗是同學與義結兄弟關係，時常來找他們聊天；陳句煙³³為做玻璃的小包商，也是陳春慶的親戚，又因為住得近，所以時常在一起，陳義農若包了人家門窗的木作工事，其玻璃生意就介紹給陳句煙去做。³⁴這一群人大多以木工、水泥、電氣及玻璃包工等相關工作維生，可說是個修造工班，彼此互相介紹生意，私下也都與廖瑞發有交往。溫萬金的安裝電氣線路工程需要泥作，做電源木箱時也需要木作，因此與他們在事業上相互支援，互動頻繁。

³⁰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2月2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virtual003。檔案原件所記「蕭成福」應為「蕭來福」（蕭友山）之筆誤。臺灣共產黨在此次事件覆滅瓦解；謝雪紅被判13年、蕭來福10年、陳義農2年，廖瑞發2年。

³¹ 許希寬（1924-1955），臺北蘆洲人，蘆洲公學校畢業，1948年4月赴香港潛入廖文毅組織中，5月，其共黨身分暴露後返臺，1952年2月與汪枝一起上鹿窟，化名老彭，1953年1月6日鹿窟被圍時被捕，時年29歲，後被判死刑，1955年8月19日槍決。〈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virtual0013。

³² 陳朝陽（1924-1955），臺北蘆洲人，臺北市大橋公學校畢業，與許希寬、蔡朝宗同在陳義農處當木工學徒，1947年6、7月間至大同鐵工廠火車部做木工，吸收盧哲德、林茂松等人，發展大同支部組織。1952年5月由汪枝帶領上鹿窟，化名關義，1953年1月6日鹿窟被圍時被捕，時年30歲，後被判處死刑，1955年8月19日被槍決。「陳朝陽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13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virtual001。

³³ 陳句煙，又名陳火烟，1924年生，臺北市人，朱厝崙公學校畢，業玻璃工，1951年春擔任鹿窟基地平地聯絡員，1953年3月22日向保安司令部自首，3月30日，以自首不坦白被扣押，後判處6年有期徒刑。「陳句煙自白書」（1953年5月21日），〈陳句煙〉，《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75292762。

³⁴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2月2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virtual003。

陳本江於1946年從北平返臺後，租了陳義農的房子居住，因而認識陳春慶和陳旬煙，以及陳義農介紹的青年工人。³⁵ 溫萬金與周植、王忠賢、陳朝陽、許希寬、汪枝、陳春慶和陳旬煙等人，後來都上了鹿窟基地，只是上山的時間先後不同，這些人的共同交集是陳義農。從陳義農的人際網絡觀察，可以串起部分鹿窟基地的基本人員。³⁶

1949年底陳義農因為廖瑞發被捕，恐再次受到牽連，開始逃亡，逃亡期間，即由溫萬金資助金錢，直至1950年8月到鹿窟，再也無法下山為止，前後共三、四次，計220元。最後於1953年2月25日，當曉基地被圍時，為保密局所捕獲，時年46歲，終被判處死刑，1955年1月31日被槍決。³⁷

除了王忠賢與陳義農，圍繞在溫萬金身邊的左傾者不少，包括張金海³⁸，1949年張金海還曾在溫萬金經營的民光電氣行做過一、兩個月的工人。³⁹ 此外，溫萬金與海山基地亦頗有淵源，1950年初陳義農因為其同業江鳳⁴⁰的關係，在海

³⁵ 「陳本江自傳」，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19。陳本江住在陳義農家，直到1947年春天才搬離，參考「陳義農回憶錄」（1953年5月12日），〈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

³⁶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2月2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virtual003。

³⁷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11月18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³⁸ 張金海（1927-1951），臺北蘆洲人，1949年夏，經廖瑞發介紹入共黨，同年，李中志、廖瑞發先後被捕，張金海1950年5、6月亦於新莊被捕。李中志、張硯和張金海為三兄妹，戰後皆參與中共組織活動。李中志父親張查某入贅女家，母親過世後，父親再娶，生張硯和張金海，故兄妹三人不同姓。李中志留學日本返臺後參加二二八事件，和郭琇琮兩人合作指揮學生軍；1949年9月8日被捕，1950年7月2日被槍決。張硯，化名施小姐，戰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5月偷渡赴港後不久，滯留中國。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臺北：臺灣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31-278。

³⁹ 「方萬土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3年9月29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⁴⁰ 江鳳，臺北人，土城國校畢業，為鹿窟事件中海山基地案的重要關係人。1948年初，受雇於許希寬承包的木工生意，1950年引介陳義農到海山地區活動，1952年12月26日被捕，時年39歲，後被判處死刑。「江鳳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7月29日），〈江鳳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40/virtual001。

山地區認識蕭有本與張常坡⁴¹，之後陳義農和江鳳、蕭有本、張常坡、廖媽景、許進旺、阿毛〔按：簡元清〕、阿宗〔按：羅英宗〕等當地人，組織了一個結拜會，當時溫萬金、王忠賢亦在內。⁴²

以上與溫萬金交往的左翼人士，廖瑞發於1950年、張金海於1951年分別被槍決，而陳義農、周植、王忠賢、陳朝陽、許希寬與蕭有本，皆因鹿窟事件先後被槍決。

二、溫萬金的組織關係

溫萬金在省工委會組織中，被保密局視為「電氣工人支部書記」⁴³，起因於廖瑞發於1947年4、5月間在王忠賢家召開一次會議，討論有關工會的事情，在場者除溫萬金外，還有陳義農與陳焰樹。廖瑞發在日治時期即經營腳踏車店，陳義農是木工、王忠賢是泥水工，而陳焰樹則是司機，他們5人當天討論各就所業發展工會，並向政府提出申請，決定由廖瑞發組織腳踏車工會、陳義農負責木工、王忠賢負責泥水工、陳焰樹負責司機，而溫萬金則負責電氣工人。溫萬金說後來其他人的工會都組織成功，但他的工會沒有組織成功。⁴⁴

另據陳義農的說法，廖瑞發在王忠賢家召開的那次會議時間為1947年7、8月

⁴¹ 張常坡為鹿窟事件中海山基地案的重要關係人，1952年底溫萬金逃亡去找他時，潘溪圳與李進來也躲在張家，王忠賢、張金海亦曾藏匿於海山地區。1953年5月海山基地案發時逃脫，1955年3月21日向內政部調查局自首。「陳義農於保密局供述海山基地建立情形」（1953年5月11日），〈臺北縣匪海山基地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4010；〈違法敵犯通緝名冊〉，《國防部》，檔案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9154。

⁴² 「陳義農自白書」（1953年5月12日），〈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

⁴³ 溫萬金之「電氣工人支部書記」名號，出現在保密局上呈參謀總長的報告中，起訴書中並未提及此事，而在最後的判決書中亦僅說明溫萬金負責發展電氣工人工作。「保密局致參謀總長報告」（1952年12月10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5。

⁴⁴ 「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簡易審判庭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0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間，廖瑞發要他去參加木工職業工會、王忠賢去水泥工會、陳焰樹去司機工會、溫萬金去電氣工會，那次見面的目的是要他們在工會裡發展組織。⁴⁵

再參考王忠賢在保密局偵訊時的說法，省工委會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於1947年底成立工人工作委員會，從事工人運動，由他和陳焰樹、溫萬金、許希寬擔任委員，同時建立司機支部、木工支部等組織，1948年3、4月間，工人工作委員會因工作開展困難而解散，於是專作臺北市泥水工會工運工作，1949年夏又領導陳義農之木工支部小組活動。⁴⁶另據許希寬在保密局供稱，工人工作委員會自1947年底成立，由許希寬和陳義農、王忠賢、陳朝陽充任委員，⁴⁷並沒有提到溫萬金與陳焰樹。兩人說法分歧，工人工作委員會經緯，尚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無論孰是孰非，關於他們加入工會壯大組織之事，以司機工會為例，已有學者研究指出，當時省工委會曾滲透司機工會吸收黨員，擴大組織並從事工人運動，但在工會之籌組創建方面，並非主導者。⁴⁸

戰後初期，臺灣的工人抗爭事件層出不窮，而其所屬產業、職種的多元，以及抗爭規模與力道之強，不亞於1927至1931年日治時期工人運動高峰。據《民

⁴⁵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12月2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virtual003；「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11月18日），〈溫萬金等〉，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

⁴⁶ 「王忠賢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4年6月14日），〈王忠賢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3/0410.9/10105033/1/031。後來王忠賢接受保安司令部檢察官訊問時，亦承認他們於1947年底成立司機支部與木工支部，至1949年夏天由他領導木工支部及溫萬金小組。「王忠賢訊問筆錄」（1954年7月26日），〈鍾興福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7/276.11/8211.2/virtual001。

⁴⁷ 除了委員名單不同之外，許希寬說委員會管轄有：大同工人支部、臺北市司機支部、臺北鐵路機工支部及木工小組、及土水〔按：泥水工〕小組五個單位，但許希寬日後在保安司令部審訊時全部翻供，說是保密局事先寫好了要他蓋章的，他並不知道工人工作委員會，亦否認參加該組織。「許希寬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12日）、「許希寬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9月23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

⁴⁸ 司機工會所發起的工運，詳情請參考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人間思想》，第20期（2019年10月），頁111、130、132。

報》所載，司機工會於1947年2月19日成立，⁴⁹ 潘溪圳⁵⁰ 當選第一任理事長，陳焰樹為常務理事。工會成立之後，陳焰樹說，他於1947年10月吸收周生發⁵¹，次年1月周生發又吸收駱雲騰加入組織，數月後，他們三個人成立司機工會支部以發展組織，以陳焰樹為「司機工會支部書記」，周、駱二人為支委，直至左翼色彩暴露，共吸收了40餘名。至於理事長潘溪圳，以其傾向自由主義，當時未獲邀，直到1949年夏天，才由王忠賢介紹加入共黨。⁵²

省工委會在其他水泥工、木工、電氣工人等職業工會組織之運作情形，由於史料稀少且零散，⁵³ 學界尚乏深入研究，究竟溫萬金在電氣工人工會及工運中扮演何角色，不僅難以明瞭，且有不少疑點。首先，溫萬金是民光電氣行老闆，旗

⁴⁹ 《民報》，1947年2月20日，轉引自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頁130。

⁵⁰ 潘溪圳，宜蘭羅東人，任廣播電臺司機，熱心籌組司機工會，1947年2月19日工會成立時，當選第一任理事長，江崑源、陳焰樹為常務理事，王大生為常務監事。司機工會在潘溪圳的領導下，辦得有聲有色，因共黨身分暴露後，逃離平地，由洪樹回接任理事長。1952年春，陳通和、李上甲、張棟柱與潘溪圳等人在海山，欲在當地建立基地，但其後認為該地地理條件不足，放棄建立基地的計畫，獨留潘溪圳負責領導群眾，其餘人等返回鹿窟。據內政部調查局的調查，他於1952年12月5日死在海山土城清化村後面。〈違法敵犯通緝名冊〉，《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9154/1；「本週會報資料」（1953年6月3日），〈臺北匪司機工會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0000C/0042/0471.12/4010-4。

⁵¹ 周生發，臺北市人，1948年4月至1949年5月於「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鋼鐵機械分公司」擔任司機，參與司機工會，吸收、組織司機工人加入地下黨組織，1949年8月，身分暴露後，與陳焰樹一同上鹿窟，化姓郭。後因偷跑下山，被陳通和帶回基地，1950年農曆5月5日（西曆6月19日）被陳通和、李上甲等人制裁。「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73；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口述史〉，收入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03年），頁146。

⁵² 「陳焰樹自白書」，〈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關於司機工會支部成立的時間，陳通和與陳焰樹的說法不同。陳通和說：陳焰樹於1947年6月吸收周生發，9月周生發吸收駱雲騰，不久成立支部，陳焰樹為支部書記，周、駱二人為支委。陳通和，「司機工會匪黨支部建立之沿革」，〈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

⁵³ 以《公論報》為例，自發刊至1952年底，有關電氣職業工會的報導，僅1948年1月30日第3版的一則「各地簡訊：臺中」，記載電氣業職業工會28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一屆會員大會，審議通過36年度決算，及37年度預算並改選理監事，按該工會37年度預算47萬6千餘元。

下有數名工人，故其身分是否能代表勞方，尚有疑義；而且，張金海受雇於民光電氣行當工人時，曾在廖瑞發的指示下，鼓動其他工人和學徒發起罷工，因而與溫萬金反目。⁵⁴ 溫萬金參加工會及省工委會支部組織的程度，值得再商榷。

其次，溫萬金雖然交友廣濶，但除了研究理論和事業上的發展之外，並不喜歡參與組織發展的活動，陳義農也說溫萬金時常去找他，很少談到組織問題，對於發展組織並不關心。⁵⁵ 最後，保密局將溫萬金移送保安司令部軍法審判，羅列的罪狀中提及，他僅於1948年夏，將廖長琚介紹給廖瑞發領導，未再做發展組織的工作。⁵⁶

1949年8月司機工會支部左翼色彩暴露，陳通和⁵⁷ 因此安排陳春慶帶領陳焰樹與周生發到鹿窟基地。⁵⁸ 陳義農於廖瑞發被捕後開始在海山等地逃亡，亦於1950年8月10日由陳句煙引導上鹿窟。王忠賢則於1949年底開始在宜蘭、海山、景美等地躲藏，1951年12月才上鹿窟基地。溫萬金鮮少涉及組織活動或吸收黨員，當時並沒有如同他們一樣，因身分暴露而逃亡，保密局直至1952年11月才查到溫萬金曾參與共黨活動，也才有了到他家裡逮人並搜出受訓筆記之事。因此，

⁵⁴ 「陳義農回憶錄」（1953年5月12日），〈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 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另外，徐火炎在保密局說，張金海曾遊說他們要求增加工資，必要時罷工，參見「徐火炎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6月9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⁵⁵ 「陳義農回憶錄」（1953年5月12日），〈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 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

⁵⁶ 「溫萬金等七名供述要點」，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601。

⁵⁷ 陳通和，1924年出生於高雄大寮，陳本江之弟。1942年3月到東京，其後考進京都兩洋中學三年級，五年級時日本政府強迫臺灣學生當志願兵，因此放棄學業逃到東京，不久轉入東京建設工學院速成科（一年制）。1946年2月回到臺灣，時年23歲。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在省立基隆中學就職，此時經由藍明谷介紹加入共黨，1947年9月中旬被批准為正式黨員。1949年9月鹿窟基地建立後，與陳本江輪流上鹿窟領導，1950年初留在鹿窟專作組織工作，為鹿窟基地上的「楊上級」。1953年2月21日於彰化花壇被捕，供出瑞芳曉基地與司機工會等多起案件，後於保密局辦理自新。「陳通和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9。

⁵⁸ 「陳通和自白書」（1953年4月27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86。

溫萬金之「電氣工人支部書記」身分，可能是保密局欲加之罪的說辭。

叁、溫萬金到鹿窟基地的背景

溫萬金之所以受邀到鹿窟基地的原因，與其他基本人員不同，而且當時鹿窟基地剛經歷玉桂嶺事件之後的人心浮動，以及來自高雄的財源被斬斷的危機，本節說明陳本江於1952年4月邀溫萬金到鹿窟的背景以及當時的基地狀況。

一、溫萬金上山的機緣

鹿窟基地基本人員上山的緣由不一，時間也不同，約在1949年8月之後，尤以1950年1月之後最多，大多與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在山下活動時，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例如方金澤⁵⁹於1948年4月與林正亨、傅世明三人由陳本江吸收入黨；劉學坤⁶⁰於1948年春由陳通和吸收入黨；林三合夫婦⁶¹則於1948年2月間同時由

⁵⁹ 方金澤，又名方欽澤，南投集集人，臺中商業學校畢，1948年4月與林正亨、傅世明同為陳本江吸收入黨，1949年8月因為傅世明、林正亨被捕，恐受影響，於10月上鹿窟基地。鹿窟基地被圍時，與王忠賢、陳焰樹、陳廖紅柑等人突圍成功脫逃，此後行蹤不明。「陳本江談話筆錄」（1954年6月13日），〈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2；「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46。

⁶⁰ 劉學坤，高雄鳳山人，日本商業學校畢業，1948年春為陳通和吸收入黨，其後與呂赫若共同負責大安印刷所印製共黨宣傳文書，1949年底上鹿窟。1953年1月13日死於國軍包圍鹿窟時。「陳通和訊問筆錄」（1954年6月20日），〈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2；「保密局致參謀總長報告」（1953年1月7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94。

⁶¹ 林三合，臺南將軍人，1942年畢業於臺灣省立臺南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為林清海之贅婿，與林素月本為夫妻，兩人同受陳本江影響加入共黨，於1950年1月上鹿窟，後離異；兩人亦同於1953年2月8日與陳本江等人自曉基地南下，1954年5月19日一同於高雄鳳山向保密局自首。林素月，新竹市人，畢業於新興國校，為林清海之養女，亦因林清海的關係，認識陳本江而參加共黨活動，在鹿窟基地的工作為教育陳銀、王茶、高碧玉等婦女隊員與會計事務。「林三合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93；「林素月談話筆錄」（1954年6月5日），〈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2。

陳本江介紹加入共黨，而呂赫若⁶²則於1949年春加入陳本江的組織，並由其直接領導。⁶³ 同為鹿窟基地指導員之一的李上甲⁶⁴，則是方金澤在臺中商業學校的同學，亦因身分暴露，於1950年1月被引上山，為陳本江的間接關係。溫萬金與上述諸人不同，情況比較特殊。

陳本江於保安司令部審理許東茂案⁶⁵時，曾以證人的身分出庭，當天審判官訊問他為何離開鹿窟基地時，陳本江說了下面一段話：

當時有個逃兵叫溫萬金，我曉得他與匪幹陳義農有很深的關係，故我要汪枝去聯絡，要他拿錢出來供給我們用。因他上山後沒有錢，又不慣軍事訓練，他就偷逃下山返家去了。當時我們在山上聽到溫被政府抓起來了，判斷基地會發生危險，所以我就離開到曉基地去了。⁶⁶

基本人員經專人引導上山，分住數個草寮，彼此之間均以化名介紹，1950年前後，其行動較自由，但隨局勢日益緊張，時常移動，又相互監視，且未經許

⁶² 有關呂赫若及其與陳本江的關係，詳薛月順，〈導言〉，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27。

⁶³ 詳「陳本江自傳」與「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694-758；「陳本江談話筆錄」（1954年6月13日），〈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2。

⁶⁴ 李上甲（1927-2014），彰化田尾人，臺中商業學校畢業，師範學院教育系三年級肄業，1949年經由臺中商業學校之同學方金澤介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即宣誓成為候補黨員，7月宣布為正式黨員，於1950年1月上鹿窟。溫萬金家被搜後，汪枝下山查探實情，久出不歸，李上甲查覺鹿窟基地不安全，於1952年12月與陳本江等人轉到曉基地，1953年1月再與陳通和南下企圖另建基地，2月21日住在彰化花壇親戚陳木成家時，被保密局包圍，陳通和當場被捕，李上甲逃脫，但於3月1日向內政部調查局投案自首，時年27歲。「李上甲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10月15日），〈鍾興福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7/276.11/8211.2。

⁶⁵ 許東茂，1932年生，臺北蘆洲人，為許希寬之弟，1952年12月1日到鹿窟的目的是想勸許希寬出來自首，不料上山之後不但沒有達成目的，還被限制行動，1953年1月10日鹿窟被圍時被捕。保安司令部原判10年有期徒刑，1954年6月17日蔣中正批示應將許東茂嚴為復審，1955年改判無期徒刑，次年定讞。〈許希寬等叛亂〉，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

⁶⁶ 「陳本江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5年8月17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virtual001。

可，不准下山，溫萬金最終不習慣山上的生活，成了逃兵，離開鹿窟。由陳本江以上的陳述，可知溫萬金上山的機緣，有別於其他人，係由於其經濟實力可能為基地提供穩定的財源。

二、鹿窟基地面臨的危機

（一）玉桂嶺事件

陳本江因為上山者日增，又因鹿窟多雨，想南下另立基地，乃於1950年4月建立玉桂嶺基地，但在新基地，基本人員分為兩個陣線爭權；據張棟柱⁶⁷的回憶，玉桂嶺基地原為「四人小組」領導，即李上甲、方金澤、林三合與張棟柱，但後來他們的領導方式由民主轉變為「法西斯」，因此劉學坤、許再傳⁶⁸、周水⁶⁹與王再傳⁷⁰覺得受壓制，形成對立的一方。張棟柱本為四人小組成員之一，也因為其他三人未尊重他的意見，而且他與王再傳、周水在上山之前都是空軍指揮部的舊識且屬同一小組，彼此有舊友情，後來倒向了劉學坤、許再傳、周水與王再傳的陣營。另外，老林〔按：陳焰樹〕本屬劉學坤等人的陣營，不知為何倒向四人小組一方。1951年6月下旬至9月間，團結終於破裂，兩方因為「生活上無

⁶⁷ 張棟柱，臺北三重人，永樂國校畢，1950年3月10日上鹿窟基地。曉基地被圍前，於1953年2月8日與陳本江等人南下，1954年5月19日於高雄鳳山向保密局自首。「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67。

⁶⁸ 許再傳（1925-1955），臺北市人，臺北市州立第二商業學校畢，1950年9月上鹿窟，1953年2月25日曉基地被圍時被捕，其後被判處死刑，1955年1月31日處決。許再傳自認地位不如林三合等其他指導員，否則當曉基地有危險，1953年2月8日陳本江等人由瑞芳南下高雄時，就不會把他留在當地了。「許再傳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9月23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⁶⁹ 周水，臺北市人，臺北市宮前國民學校畢業後，入臺灣機械公司為翻砂工，1946年轉入空軍指揮部任工役，1950年5月15日到鹿窟，1953年1月鹿窟被圍時被捕，後被判處死刑，1955年8月19日槍決。「周水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16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

⁷⁰ 王再傳，臺北市人，小學畢業，1947年任空軍指揮部傳達兵、負責看守人犯，1948-49年間參與地下組織工作，1949年8月由陳春慶介紹入大安印刷所當見習工，1949年12月6日到鹿窟。1952年初在南港舊庄發展其遠親蘇土等人，試圖開闢「松山後山基地」，未果；1953年2月25日於曉基地被捕，時年26歲，1955年1月31日槍決。「王再傳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3年8月18日），〈陳振福等叛亂〉，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平等」、「應有的權威被握」吵嘴得幾乎要打架。⁷¹ 9月，方金澤、王再傳、張棟柱與陳焰樹等四人被調回鹿窟，改由李上甲總負其責。⁷²

但影響他們從玉桂嶺基地撤回鹿窟的直接因素，是數十名刑警總隊與軍隊在當地搜山，陳本江等人以為政府派兵要來逮捕他們。早在1951年9月末，幾位基本人員被上山打獵、手執山豬鏢的隊員發現，當時雖然解釋他們是逃兵，並要求那些隊員保守秘密，千萬不要洩洩，但他們「驚惶失色」，已在做撤退的準備。⁷³ 正當九芎坑外圍組織完成全部工作後不久，11月，廖木盛⁷⁴ 告訴陳本江與陳通和，將有數十名刑警總隊和軍隊進入玉桂嶺搜山。陳本江恐暴露行跡，基於安全考量，因此派陳田其、廖溪木、陳金土等三人⁷⁵ 潛赴玉桂嶺偵查情況變化，12月4日，軍警至九芎坑一帶搜山時，他們三人險些被刑警總隊遇上，所幸接到

⁷¹ 「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86-889。

⁷² 陳通和，「玉桂嶺基地建立及群眾發展的經過」（1953年3月24日），〈玉桂嶺匪人民保衛隊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1010。

⁷³ 「李上甲談話筆錄」（1955年8月），〈陳標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6/276.11/7529.2/virtual003；「張棟柱自白書」，頁892。另，王再傳回憶：「9月，在九芎坑頭被打獵隊發現草寮，而致使總撤退到西勢。」參見「王再傳回憶錄」，〈陳本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A05050100C/0042/0410.9/75295023/0001。陳通和亦說，當時基本人員被發現後，組織命令他們撤退至西勢坑靜觀變化。參見「陳通和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9月16日）〈玉桂嶺匪人民保衛隊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1010。

⁷⁴ 廖木盛，鹿窟村民，永定公學校畢業，為石碇鄉公所總幹事，與陳春慶為公學校同學，1949年8月，由陳春慶介紹，與陳本江、陳通和相識。鹿窟基地被圍後，於1953年1月24日向駐守在光明寺的保密局人員自首，時年35歲，但最後仍被判處死刑，1955年8月19日槍決。「廖木盛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18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

⁷⁵ 陳田其為當時鹿窟村長陳啟旺之子，永定公學校畢業，1953年1月24日鹿窟被圍時被捕，時年26歲，後被判處死刑，1955年8月19日處決。「陳田其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9月23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陳金土為鹿窟事件中被捕後未依法定程序審判、違法拘留的19名鹿窟村民之一；廖溪木為鹿窟基地的連絡員，鹿窟被圍時被捕，後辦理自新，假裝脫逃至玉桂嶺為保密局做反間工作，參見「保密局報告」（1953年8月25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1070。

基本人員呼應，當夜全員秘密安全撤回鹿窟村一帶，然後再分散。⁷⁶

因軍警搜山而撤回鹿窟之事，李上甲稱為「玉桂嶺事件」。事後鹿窟基地草木皆兵，人心浮動，陳本江怕民眾動搖，為鞏固鹿窟村一帶關係，基地上的領導對於一切懂事的，知道秘密的，不分男女老幼，都強制使燒香結拜，全家人參加，然後舉行血親連坐法、集體宣誓，一直到1952年初才全部宣誓完畢。鹿窟村一帶的群眾由於強制結拜、宣誓，普遍產生反感，因此又宣布各種形式的組織，青年編入工作小組，其他編入學習小組、家庭小組，李上甲說：這是藉參加組織共同安全感來控制群眾的方法，而基地中各種委員會、調查委員、安全顧問等組織，都是有名無實，是心理戰術，鼓動群眾積極性時使用。⁷⁷

雖然近年公布的檔案證明當初刑警總隊係因為其他案件（陳溪炮案）而入玉桂嶺搜山，陳本江等人誤以為他們的秘密洩漏了，所以政府要派兵來圍剿，⁷⁸但當時此事確實促使鹿窟基地的領導階層為了防止群眾離心，實施了強制結拜、血親連坐法與集體宣誓等舉措，而這些舉措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招來群眾的反感，影響基地的穩定。

（二）經濟來源受挫

從鹿窟事件檔案中分析，基地的經濟來源除了基本人員在當地為數不多的農作與砍柴、燒炭等勞作所得之外，大約可分為3項：1. 基本人員上繳的財物；⁷⁹

⁷⁶ 陳通和，「玉桂嶺基地建立及群眾發展的經過」（1953年3月24日），〈玉桂嶺匪人民保衛隊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1010；「陳本江自白書」、「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4、895。

⁷⁷ 「李上甲自白書」（1954年2月4日），〈李上甲自首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2/FD1-1/00048/0003。

⁷⁸ 「保密局偵防組報告」（1953年5月5日），〈玉桂嶺匪人民保衛隊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1010。

⁷⁹ 上山後的基本人員大部分會將財物上繳，此類陳述如：與溫萬金交好的周植，1952年12月2日到鹿窟之後，也將身上的8百多元和1枚戒指交給劉學坤。「周植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4年12月18日），〈周植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49。

2. 由發展或山下原有組織關係中收取的黨費等；⁸⁰ 3. 捐款。

基本人員財物上繳之後，難以再奉獻，而黨費每筆10元、數十元不等，金額不大，主要的來源仍需仰賴捐款。但自1950年省工委會案發之後，陳本江在山上能獲得的固定的大筆捐款不多，其中約每兩個月派廖木盛到高雄吳某守處，可以得到其與李順法、李修共同捐贈的2千至4千元，是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⁸¹

吳某守，1914年生，高雄市人。高雄州立中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就讀名古屋藥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於1937年返臺，在高雄市開設「長榮西藥房」（後改店號為「長興西藥房」），次年，結識在大寮鄉公所任職的陳本江並成為朋友。吳某守因對政治不感興趣，未加入其組織，僅允資助，1949年陳本江到鹿窟之前，兩次給予金錢，計舊臺幣13萬元。李順法，高雄市人，彌陀國校畢，在高雄經營「太星藥局」，與吳某守為同鄉兼同學，日治時期，陳本江常至其藥局買藥而相識；李修為李順法之二兄，係藥劑師，1949年曾通過陳文彬捐給陳本江舊臺幣500萬元。⁸²

1950年冬，陳本江親筆寫信給吳某守、李修與李順法兄弟，要求財政支援，三人開始共同捐款給他，直到1952年2月，總計捐了新臺幣14,000元，分6次由廖木盛南下高雄到吳某守家去取，另外還供給盤林西林、感冒藥片等藥物以及收音機等物資。1952年2月，李修因李媽兜案發被捕，李順法逃亡，吳某守心生恐

⁸⁰ 據李上甲所言，1952年初之後，由於財政困難，要求鹿窟的「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所有成員繳交黨費或隊費。其間詳情尚待探究。「與李上甲談話筆錄」（1956年1月2日），〈蕭塗基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91/virtual001。

⁸¹ 「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3。

⁸² 李修於1952年2月因為連續供給李媽兜、李武昌（李順法之弟）金錢被捕。李順法則因此逃亡、後於12月29日出面向保密局投案自首，1953年3月又因自首不坦白，未說出曾供給陳本江金錢被捕，後被判處死刑，1954年8月24日與吳某守一同被槍決。「吳某守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7月29日）、「李順法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7月29日）、「陳通和筆述」（1953年5月20日），〈吳某守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115。

懼，開始避不見面，陳本江此一財源遂告斷絕。⁸³

溫萬金於戰後所從事的電氣包工生意，都是先向客戶收材料錢，工程做完再收工錢，出去包個工程就有錢進帳，週轉容易，此前就曾捐錢和物資給基地。⁸⁴ 陳本江知道溫萬金個性慷慨，而且與溫萬金頗有交情的陳義農、王忠賢等人，均已先後上鹿窟，所以當鹿窟基地經濟出狀況，需要財源時，就找上了溫萬金。汪枝因此受陳本江的指示下山找溫萬金聯絡，希望他拿錢出來供基地使用，1952年2月王忠賢寫信邀他，4月，由陳火烟〔按：陳旬煙〕接他上山。⁸⁵ 而他也如陳本江所願，帶著1千元上山，交給基地使用。

肆、鹿窟山上的生活與逃離

溫萬金到鹿窟之後的生活，由其筆記中可以略知一、二：

〔按：1952年〕4月14日（雨天）

生活8:30 起床，朝會及体操以後檢討工作分配。老張〔按：似為許再傳或汪枝〕指示：如果晴天，野外訓練，雨天各別學習，午後檢討文件，指示完，呼口號，承向國期〔旗〕轉身敬禮完畢。

散會後煮飲食，飽後各別學習。學習整風期間的結束和今後應努力的方向文件，午夜檢討領導隊員工作要領。

學習14:40-17:00 怎樣集中，集中和集合意思不同，老□□提問題？怎樣工作？進□向我們集中，認真工作學習，發揮守氣節，嚴守秘密，遵

⁸³ 鹿窟案發後，保密局追查鹿窟基地經濟來源，經由汪枝、廖木盛與陳通和的供述，查到吳某守、李順法與李修供給陳本江金錢。吳某守於1953年3月10日被捕，以「連續為叛徒供給金錢」判處死刑，1954年8月24日槍決。「吳某守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7月29日）、「陳通和筆述」（1953年5月20日），〈吳某守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115。

⁸⁴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86。

⁸⁵ 「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簡易審判庭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0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守規律，不是個人願望和指示，服從辯證法。老張，公有物、私有物和利益、利害關係區別，公□者顧私□著二項辯證統一起來，利益內頭就是有利害的。

怎樣叫做黨性，守氣節、實踐統一、遵守黨的黨工、黨章，黨已實踐表現怎樣服從的，不是服從一個人，義務服〔從〕馬列主義，服從客觀真理、規律性，根據個人指命〔令〕。

午夜20:30-22:00 檢討領導隊員工作要領

老張提出二個意見，鞏固基礎上發展，掩撇〔掩蔽〕大前提。政治不是大數也是乞和可以解決，□是言□順事可以掩撇〔掩蔽〕大前提。⁸⁶

溫萬金所記的在山上的訓練，白天若天晴，野外訓練，雨天則個別學習，晚上開會批評與檢討。學習的文件有「整風期間的結束」和「今後應努力的方向」，目的是訓練其黨性，讓他們能服從馬列主義，發揮守氣節，嚴守秘密，遵守黨的規律。

筆記中未記野外訓練的內容，但可參考張棟柱之記錄：

約在〔按：一九五一年〕五月，……劉上級〔按：陳本江〕也回到鹿窟去了，而我們就移動到從前老江〔按：方金澤〕的臨時點。在那裡重蓋新屋，重新訓練，如游擊體操、柔術體操、執槍等各種動作，由老江傳授柔術，由李上甲傳授日本劍術和重新學習如唯物辯證法的一章、二章、三章和軍事訓練，生活、學習等各種檢討會。⁸⁷

所謂的野外軍事訓練，有爬山、劍術、槍術、拳術等。大部分基本人員無論在保密局偵訊或保安司令部審訊時之筆錄，均記載接受訓練的事，只是詳簡不同。其中較系統性地描述受訓情況者，當屬1950年9月到鹿窟基地的許再傳，他說他在山上分三階段接受訓練：

第一階段：1950年9月至1951年4月間〔按：在鹿窟〕，閱讀共黨理論書籍，有唯物辯證法，均係油印抄件。

⁸⁶ 「搜獲文件」，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10。

⁸⁷ 「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85。

第二階段：1951年5月起至11月止，因為1951年5月1日前，刑警在石碇鄉抓流氓，流氓鳴槍拒捕，恐波及基地安全，除了陳春慶及陳義農留在鹿窟之外，全部遷至坪林〔按：玉桂嶺基地〕開始培養黨性的訓練，注重服從、吃苦耐勞、飢餓訓練、不睡眠訓練等。

第三階段：1951年12月起，全部回鹿窟，與第一階段相同，不過增加一項學習檢討，以辨證法為討論主題。⁸⁸

訓練時間的三階段之說，在時序上與陳本江的基地發展過程大致相符，主要係受玉桂嶺基地的建立與玉桂嶺事件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1952年之後才上山者，沒有三階段訓練的經驗，但他們多表示受過勞動訓練、飢餓訓練等，而且經常開會檢討。⁸⁹

溫萬金在保安司令部審訊時，並不承認曾在山上受過訓，只說是去養病。但廖長琚說，他於1952年7月間與溫萬金會面時，溫說他曾在山上接受訓練二個月，學柔道和讀書。⁹⁰ 其他記載溫萬金在山上受訓者，還有張棟柱：

〔按：一九五二年〕二月頃，……，幫助老江〔按：方金澤〕教育與訓練新上基地的黨員，名為彭〔按：許希寬〕、潘〔按：汪枝〕、後來增加一五五〔按：溫萬金〕、闕〔按：陳朝陽〕。⁹¹

因此，溫萬金在山上不僅接受訓練，而且受完訓後還被派到海山基地工作。林三合在發展海山基地過程的紀錄中，曾出現過溫萬金的身影，⁹² 而張棟柱對於

⁸⁸ 「許再傳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3年8月18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⁸⁹ 例如1952年5月才上山的陳朝陽，表示有柔道、劍術、槍法等軍事訓練，燒炭、砍木柴等勞動訓練，飢餓、刻苦、雨天工作、自我批評、互相批評等改造教育，階級意識、辯證法等理論教育等之訓練。「陳朝陽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13日），〈許希寬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36。

⁹⁰ 「廖長琚提供」（1953年4月16日），〈廖瑞發〉，《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00221212。

⁹¹ 「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96。

⁹² 「林三合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26。

此事的記載較詳細，指出溫萬金於1952年春在海山的活動情形：

同年〔按：1952年〕，曾與老葉〔按：王忠賢〕、李上甲、林三合，被派為先鋒隊，由李上甲領隊妄想重打新基地，先由鹿窟出動，跑有八、九點鐘的山路，才穿過山地，進入景美。由景美抵達老葉〔按：王忠賢〕朋友家裡休息，當天即刻走到一號（阿本〔按：蕭有本〕家裡），在那裡休息到暗，才由阿本帶至二號（エビ〔按：阿埤，即張常坡〕家裡）在那裡接見一五五〔按：溫萬金〕、エビ〔按：張常坡〕（黨員）…，再重新發展兩個（名忘記），同時在那裡蓋了一所茅屋，檢討會都在那裡開。⁹³

海山與鹿窟基地在地理空間上相隔甚遠，這段記載同時說明從鹿窟到海山徒步一日內可達，以及兩基地間聯絡路線的問題。

溫萬金與山上的基本人員生活艱辛且不自由，由於糧食等物資缺乏，時常處於飢餓狀態，「一個月每人的白米節到十五斤，日日都是過了飢寒交迫的日子。」⁹⁴ 每天經常的活動是所謂的勞動訓練，亦即鋸木材、燒炭、砍木頭、種菜等工作以換取生活所需，而所謂的機動化、游擊化生活就是不斷地更動地點，從甲地遷到乙地。⁹⁵ 陳春慶也說，他們後來在瑞芳曉基地的生活大多以勞動生產為主。⁹⁶

鹿窟山上不自由的生活，陳義農的述說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他到山上以後，在草寮裡待了一年多才見到王忠賢，既沒錢，身分證也交出去被保管，整天在草寮內看書、學識字、炊飯，有時替人修理伐木工具，除了取水和洗東西外，不能離開草寮，還不敢隨便講話，「如果說句對他們不利的話，就會被人報告受責難，溫萬金、許希寬、陳朝陽等都被隔絕，無法相見，陳春慶和汪枝是他們的心腹，王忠賢

⁹³ 「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904。

⁹⁴ 「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909。

⁹⁵ 「林茂同自白書」（1953年1月16日），〈大同鐵工廠匪支部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71.12/4003。

⁹⁶ 「陳春慶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5年7月），〈陳春慶〉，《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75295060。

雖是老朋友，仍是半個朋友。」⁹⁷ 許再傳也說他雖然於1952年初升任指導員，但到鹿窟基地後住在草寮裡，也受到控制，被監視得很嚴，生活不自由。⁹⁸

而且，基本人員之間的相處，難免衝突，由保密局在山上搜獲的「批評與報告」一文，顯示林三合與劉學坤兩位指導員率領陳義農、林茂松等數人在山上的炭窯燒炭，從事勞動訓練並領導群眾訓練，彼此之間因為工作分配及生活習慣產生摩擦。⁹⁹ 尤其愈接近1952年末，政府搜捕的壓力日益增強，活動困難，財政更是左支右絀，李上甲說：基地上的人對於勞動訓練普遍表示反感，加之領導分子禁止本地男女結婚，自己又秘密地和本地婦女結婚，引起群眾憤怒。¹⁰⁰

由以上說明可知山上生活的艱苦，溫萬金不習慣這種匱乏的生活條件與軍事訓練，最終因為無法適應如此刻苦又不自由的生活，偷逃下山返家。基地上規定，未經上級批准，不許下山，例如周生發有嚴重的胃下垂，有一次偷偷回家拿藥，陳通和怕周生發洩露行蹤，因此將他帶回基地，於1950年農曆5月5日（西曆6月19日）先讓他喝下摻了催眠藥的菜湯，再與李上甲、王再傳、張棟柱等人合力處死。¹⁰¹ 此為基地上一次既殘酷又血腥的清算鬥爭。就時序來推測，省工委會蔡孝乾、張志忠、陳澤民、洪幼樵與許敏蘭等人陸續被捕的消息，於1950年4、5月才傳到鹿窟山上，¹⁰² 因此制裁周生發的時間點，基地上正當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緊張狀態。

⁹⁷ 「陳義農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報告」（1954年12月2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⁹⁸ 「許再傳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報告」（1954年9月23日），〈陳振福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63。

⁹⁹ 林茂松於1952年4月才到鹿窟，該文件產生的時間應在彼時之後。「批評與報告」，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186。

¹⁰⁰ 李上甲所言，應指陳本江與陳銀、陳通和與林素月在鹿窟生兒育女。「李上甲自白書」（1954年2月4日），〈上甲自首案〉，《法務部調查局》，檔號：AA11010000F/0042/FD1-1/00048/0003。

¹⁰¹ 制裁周生發之事，又稱「X事件」，詳「張棟柱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873；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口述史〉，收入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頁146。

¹⁰² 陳本江說他於1950年4月知道四工委被捕，恐群眾動，即刻進行反宣傳；陳通和則說，5月報紙發表省工委組織破案時，基地上整個的人員都有些恐怖和喪志。「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1；「陳通和自白

然而，溫萬金離開鹿窟後，失去聯繫，汪枝於1952年6月奉上級之命下山請李鐘瑞¹⁰³尋著溫萬金，並與溫萬金見了一次面，至於兩人見面談了些什麼，汪枝未交待，¹⁰⁴李鐘瑞也說他不清楚當天的談話內容。溫萬金為何未被押回山上接受制裁？原因不明。

伍、鹿窟基地被圍

鹿窟基地遭破壞的近因為經濟困難，不得不下山找財源，遠因則為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基地本身的問題。

鹿窟基地經濟困難的問題已於第三節說明，以下先就國際局勢來談。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當天晚上召集會議，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1893-1971）本來有意放棄臺灣，此時改變立場，在會上建議，下令第七艦隊自菲律賓航向臺灣海峽，防止中共攻擊臺灣，同時阻止臺灣向中共用兵。27日，杜魯門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避免臺海軍事衝突，之後更開始對臺灣提供軍事及經濟援助。此外，中共干預韓戰，1951年11月美國亦表態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¹⁰⁵由此，蔣中正退守臺灣之後的軍、政危機解除，對內持續肅清潛伏臺灣的中共地下組織，不僅陳本江等人配合中共解放軍解放臺灣的希望渺茫，鹿窟基地也在政府加強掃蕩之下終被破獲。

就鹿窟基地本身的問題而言，當初陳本江並不覺得鹿窟是個理想的安全處所，因為王萬得、張朝枝、林慶雲、張金海、張硯、李瑛等人也都曾藏匿於當地，

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89。

¹⁰³ 李鐘瑞，1930年生，臺北蘆洲人，蘆洲國校畢，以木工為業，與許希寬為師兄弟關係，亦為陳朝陽妻舅，曾到溫萬金經營的民光電氣行做電源木箱十餘次，因此與溫萬金及電氣行的工人陳文卿、張金海相識。1952年11月28日因為陳文卿供出他與張金海參加組織活動而被捕，後被判15年有期徒刑。李鐘瑞說汪枝於1952年6月經由他找溫萬金去汪枝家談話，但只有一次。「李鐘瑞於保安司令部訊問筆錄」（1953年9月29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⁰⁴ 「汪枝談話筆錄」（1953年8月17日），〈黃崇國等叛亂案〉，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⁰⁵ 林正義，〈比較杜魯門與布希總統危機處理政策——以韓戰及波斯灣戰爭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5期（1994年4月），頁140；林正義，〈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研究》，第19卷第4期（1989年12月），頁94。

知道的人更多，曾嚐試在蘇澳等地建立基地未成，另一方面料想政府不致於那麼快就找到鹿窟，因此也就「既來之，只好安之了」。¹⁰⁶事實上，鹿窟事件爆發之前，數度險些被官方察覺。

臺北縣警察局於1951年12月28日接獲新店分局的報告，在五堵、汐止、鹿窟三角地帶之康誥坑有不尋常的人士出沒，29日雖飭刑警隊查辦，但後來並無具體結果。¹⁰⁷1952年2月王再傳、林三合與陳通和三人亦差點被警察局查獲，起因於王再傳於玉桂嶺事件後，在南港舊庄發展其遠親蘇土，試圖建立新基地，但在擴大組織過程中被密告，幸而事前獲得通報，王再傳等人逃回鹿窟。¹⁰⁸

蘇土案發後，警方及情治人員多方探察王再傳的行蹤，1952年5月間，汐止刑警孫蔚波獲得線報，四分里第六、七鄰附近山上有一茅屋，頗不尋常，前往偵查，得知為王再傳等人之居所，為了避免打草驚蛇起見，不敢立即闖入，待至晚間，保安司令部人員及警方派出大批人力包圍搜查，王再傳等人亦事先接獲通報，及時逃走。¹⁰⁹據刑事組長方賀田說，當他帶著50名精幹要去執勤時，碰巧遇到廖木盛，是廖木盛去通報的，等警察趕到時，草寮裡的飯菜都還是熱的。¹¹⁰

以上幾次危機均安然度過，但汪枝被捕一事，就沒這麼幸運了。

汪枝於1952年2月11日與許希寬一起由陳春慶之弟帶領上鹿窟，受訓兩個月後，5月開始擔任平地連絡員，化姓江、潘、張，¹¹¹負責鹿窟山上與臺北市的連

¹⁰⁶ 「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0。

¹⁰⁷ 「臺北縣警察局報告」（1953年1月14日），〈可疑分子考管——臺北縣匪基地案〉，《內政部警政署》，檔案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41/306.7/0201。

¹⁰⁸ 有關王再傳1952年2月險被察覺之事，亦稱「後山案件」，他們本想在當地發展「南港獅仔形松山後山基地」，最後只發展了3個人，即以失敗收場。詳細經過請參考薛月順，〈導言〉，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16。

¹⁰⁹ 「孫蔚波於汐止刑警組報告」（1952年5月13日），〈可疑分子考管——鹿窟村文山區武裝匪謀案〉，《內政部警政署》，檔案號：A301010000C/0042/200/0072。

¹¹⁰ 張炎憲訪問，高淑媛記錄，〈方賀田訪問記錄〉，收入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文化中心，1998年），頁135。

¹¹¹ 「汪枝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6月8日），〈陳旬煙〉，《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42/0410.9/75292762；「汪枝於保密局談話筆錄」（1953年8月17日），〈黃崇

絡工作，山上的領導們因被通緝，不便下山活動的事，即交由他來處理，例如劉學坤離開臺北去鹿窟之前將共黨書籍文件交給英商德記洋行職員阮英明與陳全泰¹¹² 保管，他們曾與劉學坤有組織關係。1952年5月間，陳本江派汪枝，拿著一封劉學坤的親筆信，下山與阮英明接洽，主要目的是希望獲取物資與財政支援，¹¹³ 成功接上關係之後，收取黨費等工作，也由汪枝負責。由於他時常下山處理類似的事情，平地的消息亦經由他傳遞，一旦暴露，被捕的機率很高，又因為他比其他隱居在山上的基本人員，更瞭解基地上的內情，若被捕並供出，對基地的破壞力之大，不言而喻。11月，溫萬金出事後，上級認為不宜讓汪枝繼續擔任連絡工作，將部分工作，包括收取黨費等，轉移給其他人。¹¹⁴

後來保密局得知溫萬金與許希寬兩人都在1952年春天失蹤，而且溫萬金失蹤兩個月返家後，行蹤飄忽；許希寬大約半個月回家一趟，將山上所鋸的相思木拿到山下賣錢，還要家人替他準備鋸子、斧頭之類的工具，於是保密局在他家守株待兔，希望能同時逮捕許、溫兩人。溫萬金逃走後的半個月，許希寬果真返家取工具，被保密局一舉成擒，但當時他一問三不知，只透露汪枝也時常下山，谷正文因此研判，汪枝是一個重要的連絡人，決定放長線釣大魚，放走許希寬，好引出汪枝，¹¹⁵ 但許希寬一進入山區就不見蹤影，計謀不成。

谷正文直到1952年12月22日扣押李媽喜¹¹⁶，偵查汪枝的工作才有所進展，經

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¹² 阮英明，彰化人，1946年3月間畢業於彰化商業職業學校；10月，任職於工礦公司所屬玻璃公司時，與劉學坤共事；1948年9月轉職臺北市英商德記洋行，因為被汪枝供出曾交付黨費，1953年1月29日被捕入獄，時年24歲。陳全泰亦為彰化人，與阮英明同樣任職於德記洋行並同時被捕，時年28歲，兩人均被判處死刑，1954年4月6日同日槍決。「阮英明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6日）、「陳全泰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3月8日），〈曾文隆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15。

¹¹³ 「汪枝於保安司令部偵訊筆錄」（1953年9月24日），〈曾文隆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15。

¹¹⁴ 「汪枝提供資料」（1953年5月12日），〈李書勳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5。

¹¹⁵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頁149。

¹¹⁶ 李媽喜，臺北蘆洲人，亦為「老臺共」，1931年總督府大規模掃蕩臺灣共產黨時，被判刑2年入獄。戰後曾任鄉民代表，於1952年12月22日被保密局偵防組扣押，時年48歲，其後

由李媽喜得知，陳朝陽於1952年5月逃至鹿窟後，李鐘瑞曾向李媽喜與王紅九等人索取金錢，部分交由汪枝轉交給陳朝陽。¹¹⁷汪枝於12月20日下山探查溫案實情，26日，就在延平北路臺北橋附近被保密局逮捕，李媽喜因此被谷正文視為偵破鹿窟基地的重要人物。¹¹⁸谷正文未說明如何經由李媽喜與李鐘瑞的線索找到汪枝，其間細節未詳，但已足以顯示保密局抓到的人愈來愈多，線索也愈來愈綿密，即使溫萬金和許希寬這條線斷了，依然可以從其他途徑找到汪枝的下落。

汪枝被捕時，起先的態度異常頑強，拼死掙扎，執行逮捕人員為了制止他自殺，有二人被咬傷及撞傷，後來經過10小時才被說服，全盤供出基地的位置、交通路線、負責人員、經費、糧食供給、生活與訓練情形以及山上的警戒與武器數量等訊息，¹¹⁹保密局至此才得知溫萬金受訓的秘密基地原來位於鹿窟。

汪枝被捕兩天後，保密局馬上與保安司令部接洽合力搜捕鹿窟基地，一面報請國防部出動部隊包圍整個山區，斷絕交通，一面動員保密局和保安司令部精幹進入山區，於28日夜出動，29日拂曉才開始拘捕行動。¹²⁰

因此，鹿窟基地之所以遭國軍包圍，從溫萬金家搜索出記載在基地受訓情況的筆記只是個開端，情治人員除了知道有個共黨的基地存在和訓練概況之外，根本無法據此得到諸如確實位址、武裝情形等有用的突破點，倘無汪枝之落網且全盤供出內情，國軍無法立即進行圍捕。

被釋放。「李媽喜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8月18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¹⁷ 陳朝陽於1952年5月上鹿窟後請汪枝下山時轉告李鐘瑞，讓李鐘瑞向王紅九索取被積欠的工資，因此汪枝於1952年6月奉上級之命，下山取得李鍾瑞拿到的金錢後，交給上級，陳朝陽並未拿到這筆錢。「陳朝陽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3年8月16日）、「李媽喜於保密局談話筆錄」（1953年8月18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¹⁸ 「谷正文致林炳陽代電」（1953年9月13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¹⁹ 「保密局致參謀總長報告」（1952年12月28日），〈鹿窟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48/378.1/0021。

¹²⁰ 「保密局致參謀總長報告」（1952年12月28日），〈鹿窟專案〉，《國防部》，檔號：A305000000C/0048/378.1/0021。

陸、溫萬金之落網

1952年11月27日保密局逮捕溫萬金的行動失敗，溫萬金幸運逃脫了。國防部及保密局的報告對此隱而不明，但溫萬金的兒子溫世勳受訪時，詳盡且生動地描述這段經過。溫世勳說他爸爸向來很疼他，保密局的人到家裡來的那天，他不小心打破玻璃，被媽媽罵並處罰禁止吃晚餐，晚上爸爸回家時，幫忙把碎玻璃包起來，還到外頭買一碗麵要給他吃，沒想到爸爸買麵回來的時候，大批情治人員跟著一起進門，有的從前門進來，有的守在後門，屋裡屋外擠滿了人，帶頭的人拿一張單子給溫萬金填寫後就撤走，只留一人監視。接著，他看到溫萬金拿出一支香菸給那位留守者抽，抽著抽著，可能疲累或心情放鬆的緣故，竟然睡著了。溫萬金見機不可失，便打開後門直接走了，還叫他們回去睡覺；那一夜，外面下著大雨。溫萬金體格碩大，第二天，留守的人為了卸責，竟拆下廁所的窗戶並反鎖廁所的門，對上級說溫萬金是從廁所窗戶溜走的。¹²¹

溫萬金於1954年3月30日¹²²落網之前，逃亡的足跡大抵在新莊、松山、基隆、萬華間遊走，尋求協助的對象都是他往日工作上的朋友或親戚與舊識，多以為人作保，躲避債務，必須在外暫避為由借宿，並以打零工維生。¹²³

¹²¹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勳母子訪問紀錄〉，頁194。

¹²² 關於溫萬金被拘入獄的日期，不同卷宗檔案中出現分歧，除了保密局的報告，溫萬金無論在保密局或保安司令部訊問時，皆回答是3月30日，但保密局通報溫萬金已被捕，令所屬臺北站停止偵查時說：「查溫匪萬金一名業經本局偵防組於3月28日捕獲，兄站可即停止偵辦。」3月28日是保密局得到線報，確定溫萬金和方萬成將於30日與溫嘉寬在枋寮車站見面的日期，可能是筆誤，也可能是保密局將確知溫萬金下落的日期誤認為捕獲日期。「朱元敬致余重實代電」（1954年4月5日），〈人名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9/0410.9/8000。

¹²³ 溫萬金於1952年11月27日當天晚上先躲在住家旁的防空洞，28日去找周植及周植義兄弟，在周植義家住了一夜後，29日到海山冷水坑張常坡（張阿埤）家；住了4、5天之後，轉移到新莊，找姑表兄弟陳泗海、陳欽鎮，告訴他們他因為為人作保，躲避債務，所以借住一陣子。期間曾在隣長廖水泉家的牛房偷住過4、5次。他在新莊住到1953年4月間，陳家兄弟為了分產，發生口角，他不願再繼續住下去才離開。離開新莊後逃到基隆，在基隆從事打石工的張發家住了2個多月，並在八堵山幫人做墳墓維生。1953年7月潛往萬華找鐵工王天泉，在店中幫忙做抽風櫃打鐵的小工，直至1954年2月因王天泉生病而離開。之後再到松山，在做建築紮鐵筋工的陳根旺家住了十幾天，皆以為人做保被追債，必須在外暫避

對於溫萬金之落網，究係其主動自首後才被拘押或為保密局所緝捕，兩方主張截然不同。

保密局認為溫萬金之所以落網是其費心布署的結果：「本局（保密局）前偵辦逃匪溫萬金一案，經運用關係，於本年3月30日將該溫萬金一名緝獲到案。」¹²⁴

保密局在線民的布署方面，例如李木枝。¹²⁵ 李木枝為保密局搜集情資的手法之一是再利用線民，此為保密局線民之下還有線民的網絡布置。李木枝經由其他關係線民輾轉探得的情報有二：某電氣行老闆說有人於1953年12月間，在萬華往板橋遠東紡織廠的路上見過溫萬金，當時溫萬金騎腳踏車、頭戴竹笠、赤腳，身形比以前瘦；又據松山某人稱1954年初在松山地區見到溫萬金。¹²⁶ 另外，保密局臺北站也向保密局報告，線民葉秀夫於1953年12月與1954年2月19日，兩次在板橋遠東紡織廠附近街上見過溫萬金。保密局根據上述情資，下令臺北站注意跟監，一旦發現其行蹤，馬上會同偵防組合力緝捕歸案。¹²⁷

此外，保密局還利用溫萬金之親朋偵查，例如他的弟弟溫嘉寬以及親戚陳文卿。當時溫嘉寬住在溫萬金家樓上，溫萬金於1952年11月底脫逃後，保密局馬上

為由借宿。此外，溫萬金從新莊到基隆途經汐止，去找過同業潘陳火，在基隆張發家時也找過舊友戴成枝和鄭金祈尋求協助。「溫萬金於保密局訊問筆錄」（1954年9月21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²⁴ 「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4年10月5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597。

¹²⁵ 李木枝，化名張志峰，臺北樹林人，1952年12月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為中央造幣廠技工。原涉入周源茂、張潮賢等「三角埔隱蔽基地案」（1953年8月11日保密局破獲），1953年3月透過中央造幣廠人事科長廖承志（廖志釗，亦為保密局臺北站義務運用人員）向保密局臺北站投案，4月，保密局為其辦理自首，以協助逮捕周源茂等人（李木枝與周源茂為樹林國校同學）。「內線工作人員登記表」，〈三角埔匪武裝基地破獲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9/0471.12/1010。李木枝協助破獲「三角埔隱蔽基地案」後，繼續為保密局提供情報。他曾為了布線偵查，請假過多而被扣薪水，保密局為此甚至補償其損失，保密局於往來公文中稱其為自首人、自首分子、義務運用人員或內線自首分子等。「余重實致朱元敬代電」（1954年4月7日），〈人名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9/0410.9/8000。

¹²⁶ 「李木枝報告」（1954年1月29日），〈人名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9/0410.9/8000。

¹²⁷ 「朱元敬致余重實代電」（1954年3月10日），〈人名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9/0410.9/8000。

抓溫嘉寬去問話，並以准其自首交換密告溫萬金的下落。保密局偵防組組員陳火土還住進溫嘉寬家裡，並與溫嘉寬妻子交換條件，若能提供消息，就讓溫嘉寬辦理自首。¹²⁸ 陳文卿是溫嘉寬的妻舅，曾在民光電氣行做過電氣工人，身兼溫萬金的姻親與員工之雙重身分。1952年11月28日，即溫萬金逃走後的次日，為保密局所捕並被說服成為自新人員，轉而為保密局服務並提供溫萬金的相關消息。¹²⁹

溫萬金落網前的最後足跡在萬華，由方萬成¹³⁰ 居中聯繫溫嘉寬以求援。1953年底，溫萬金路過萬華方萬成的岳家，當時方萬成去當地參加廟會，看到溫萬金，叫他進去吃酒，方萬成知道他家被搜之事，問他外面人這麼多，怎麼還敢出來，他謊稱那件事已解決。1954年農曆正月初八（西曆2月10日），溫萬金在萬華街上再次見到方萬成，當時拜托他去通知溫嘉寬帶錢來見；3、4天後依約在萬華西園路上和溫嘉寬見面。¹³¹ 之後，3月20日左右，溫萬金去找方萬成，請他約溫嘉寬於30日在萬華郊區枋寮車站相會；3月28日，方萬成將訊息告訴溫嘉寬。¹³²

之前溫萬金請方萬成去向溫嘉寬拿錢時，溫嘉寬的妻子就將此消息告訴陳火土。保密局亦主張他們於3月28日同時收到溫嘉寬與陳文卿情報，得知溫萬金、方萬

¹²⁸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96。

¹²⁹ 陳文卿，臺北市人，1942年畢業於臺北市師範學校第二附屬國民學校，曾在臺灣總督府充照相師，戰後在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任繪圖員，19歲在臺灣鐵路局任隨車員，一年後到溫萬金的民光電氣行做電氣工人。1952年11月28日被捕，罪名為參加李秋金之「三重埔支部」，時年25歲。陳文卿於被捕當日即向保密局辦理自新，並供出黃崇國、李來園、李添木、李鐘瑞、徐火炎、方萬土等人與張金海有往來。「陳文卿於保密局談話筆錄」（1953年6月5日），〈黃崇國等叛亂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3/276.11/109。

¹³⁰ 方萬成，臺北市人，為電氣工人，因為替溫萬金連絡溫嘉寬並相約見面而未向政府告密檢舉，被保密局移送軍法審判，195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時年32歲。「溫萬金等七人供述要點」，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605-6。訊問筆錄的資料記載，方萬成說溫萬金是其母舅，自幼相識，但溫世動的訪問紀錄，說他和溫萬金是朋友關係，參見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96。

¹³¹ 「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4年10月5日），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頁600；「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簡易審判庭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0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² 枋寮車站為日治時期公共汽車從板橋開往萬華後的第二個公車站。「方萬成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2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成與溫嘉寬將於30日在萬華郊區見面時，除密令溫嘉寬依約前往外，另會同保安司令部警衛大隊人馬，事先化裝埋伏，當溫萬金與方萬成出現時，馬上將其緝捕。¹³³

但溫萬金自始至終都認為他是自己出來向保密局自首，而非被捕，否則他是有機會逃走的，他在保安司令部審訊時強調：

他們二人〔按：溫嘉寬與方萬成〕給我談妥了自首事，我也找他們好幾趟，結果由他們二人帶我出來自首，在半路便有保密局人員一同帶我到保密局。後來保密局人員說我所講不實，將我扣押。¹³⁴

溫嘉寬與方萬成都證實這項說法。溫嘉寬在審判庭上說，當1954年2月間溫萬金透過方萬成向他拿錢時，立即向保密局報告此事，保密局說，錢可以給，但要勸他出來自首；兄弟倆在萬華西園路見面時，溫萬金雖同意自首，但時間上需要再遲些；等3月30日再見面時，溫萬金問溫嘉寬到何處自首，溫嘉寬回答跟著他走就行。保密局人員當場並未將溫萬金的手銬起來，溫嘉寬還陪同一起坐車到保密局才回去。¹³⁵

方萬成則說當初溫萬金要他向溫嘉寬拿錢時，溫嘉寬就說溫萬金要出來自首了，後來方萬成詢問溫萬金準備何時辦理自首，當時溫萬金就明確表示是3月30日，因此他是當天帶溫萬金出來自首時，一起被扣押的。¹³⁶

因為溫萬金、溫嘉寬與方萬成三個人的說法一致，而且當天保密局對待他並未如同其他被緝捕者一樣，戴上手銬。為此，保安司令部審判官質疑保密局緝捕之說，於1954年11月25日發函向該局詢問：「訊據溫萬金、方萬成均供稱3月30日係往貴局自首，與貴局來函所稱運用關係，將溫萬金一名緝獲情形未盡一致，

¹³³ 「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4年12月16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⁴ 「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簡易審判庭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0日）、「溫萬金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筆錄」（1955年1月12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⁵ 「溫嘉寬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訊問筆錄」（1954年11月24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⁶ 「方萬成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調查庭訊問筆錄」（1954年10月19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究竟實情如何，請查明見復。」¹³⁷ 12月16日保密局的回信，雖承認2月間確曾通過溫嘉寬勸其自首，但因被拒，所以才有3月30日的緝捕行動。¹³⁸

保安司令部審判官最後採信保密局的說法，於1955年1月17日的判決書中將溫萬金判處「二條一」¹³⁹ 唯一死刑。由此反映當時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政治案件時，偏向以保密局之偵查定罪的現象。

政府對於鹿窟事件涉案者的處置，另一個經常被提出來檢討者，為真正的共產黨首腦，例如陳本江、陳通和、李上甲等人，通過向情治單位自首、自新，得以脫罪，然而當地的群眾，僅「蕭塗基等叛亂案」一個案件中，除了石碇鄉公所總務課長黃伯達之外，就有12名分布於鹿窟村、中民村、白雲里、東山里等地的村民被判處死刑。¹⁴⁰ 此有違一般人心目中公平正義的現象，也存在於基本人員之間：真正的共黨支部書記陳焰樹，潛伏在司機工會中發展組織，身分暴露後逃往鹿窟，基地被圍時突圍脫困，逃亡數月後向保密局自首，並供出司機工會支部所屬成員，存活了下來；相較之下，參與組織活動並不深的溫萬金，欲求自首而不可得，最終難逃一死。

溫萬金於1955年5月6日被槍決，得年37。他被綁赴刑場槍決前，在口袋裡放了幾封寫給親朋的信，說他是冤枉的，要家人不用去領屍體，任隨化為塵土，也不要參加政治活動，忍耐過日子，有一天解放軍會來，就有好日子過，叫他們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¹⁴¹

¹³⁷ 「保安司令部致保密局函」（1954年11月25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⁸ 「保密局致保安司令部函」（1954年12月16日），〈溫萬金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號：A305440000C/0045/276.11/9122.59。

¹³⁹ 「二條一」為《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絕大多數的政治犯的罪名是違反刑法第100條第1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¹⁴⁰ 「蕭塗基等案」判決書中計：蕭塗基、王老見、王新發、廖西盛、陳萬居、林金子、詹清標、廖有慶、廖埤、余福連、高火旺、李紫與黃伯達等13名被處死刑。

¹⁴¹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97。

在他即將赴死，踏出看守所大門時，出其不意用預藏罐頭重擊衛兵頭部太陽穴，衛兵應聲倒地，溫立即上前奪槍，因槍帶被倒地的衛兵壓住，一時取不下，不料圍牆上還有一名衛兵，看到同伴受傷，刺刀朝下，連人帶槍，從15尺高的牆上飛躍而下，刺刀刺透溫萬金身體，血流滿地。¹⁴² 溫萬金於行刑前反抗且被刺傷，其他獄友亦曾目擊，陳英泰也說溫萬金拿出藏在身上的石頭，拚命往看守頭上猛打，在看臺上的衛兵立即跳下地面，用刺刀猛刺使其就範，再押赴刑場結束生命。¹⁴³ 滿腔怨氣，無處發泄，1950年代政治犯臨刑前的心境，由溫萬金的案例，不難從中體會一、二。

柒、結語

鹿窟事件的爆發源頭為保密局在溫萬金家裡搜出了一份他在鹿窟基地受訓的筆記。然而，此為鹿窟事件的觸發因子，情治單位僅由此得知有個中共地下黨員的基地存在，直到汪枝被捕，才知道基地究竟在何方。表面上，從發現溫萬金的訓練筆記到汪枝落網是顯而易見的因素，但鹿窟基地遭破壞的近因為經濟困難，不得不下山找財源，遠因則為基地本身的問題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不宜簡單地歸因於溫萬金或汪枝。

經濟問題是當時基地迫切需解決者，正如陳本江所言，他們固定來自於高雄吳某守等人的財源中斷，因而不得不下山募款，要募款必須發展，於是埋下未來基地被破壞的種子。¹⁴⁴ 財務狀況不良，亦使得基地體質孱弱。

至於基地本身的問題，鹿窟基地發展至1952年，群眾對於玉桂嶺事件之後所實施的集體宣誓與血親連坐產生反感，再加上山上的生活不易，基本人員素質不一，彼此之間時有衝突，甚至為了爭權而分裂；領導者不僅以勞動訓練之名，讓他們從

¹⁴² 李石城，《鹿窟風雲》（臺中：白象文化，2017年），頁129。

¹⁴³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頁197。

¹⁴⁴ 「陳本江自白書」，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頁755。

事砍柴、燒炭、農耕等勞作，還經常處於飢餓狀態，而且上級禁止本地男女結婚，自己又秘密地和本地婦女結婚，亦引起群眾憤怒，其內部不穩之態早已浮現。

再者，陳本江在鹿窟建立基地後，還向外擴展，但由於他們隱蔽於山區，所發展的群眾亦侷限於當地居民，山民世居，彼此之間不是親戚就是朋友，較不利於組織隱秘性的安全要求，因而曾有幾次險些被查獲。

最後，蔣中正退守臺灣的軍、政危機，因為韓戰之爆發而解除後，對內持續肅清潛伏臺灣的中共地下組織，對社會的控制力日益增強，使得局勢越來越不利於中共地下組織的發展，不但基地主要財源的募款越來越難以進行，而且情治單位偵查的觸角也日益延伸，不僅溫萬金和汪枝，其他鹿窟基地重要關係人，也可能難以避免在各種情形下被查獲，甚至被捕，進而供出基地內情，鹿窟事件的爆發，只是遲早的問題。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內政部警政署》（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可疑分子考管——鹿窟村文山區武裝匪諜案〉。
〈可疑分子考管——臺北縣匪基地案〉。
-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李上甲自首案〉。
- 《國防部》（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鹿窟專案〉。
〈違法敵犯通緝名冊〉。
-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人名案〉。
〈三角埔匪武裝基地破獲案〉。
〈大同鐵工廠匪支部破獲案〉。
〈王忠賢案〉。
〈玉桂嶺匪人民保衛隊破獲案〉。
〈陳本江〉。
〈陳旬煙〉。
〈陳春慶〉。
〈廖瑞發〉。
〈臺北匪司機工會破獲案〉。
〈臺北縣匪海山基地破獲案〉。
〈蔡孝乾〉。
-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江鳳等叛亂案〉。
〈吳某守等叛亂〉。
〈李書勳等叛亂案〉。
〈周添壽等叛亂案〉。

- 〈周植叛亂案〉。
- 〈許希寬等叛亂〉。
- 〈陳振福等叛亂〉。
- 〈陳標等案〉。
- 〈曾文隆等叛亂案〉。
- 〈黃崇國等叛亂案〉。
- 〈溫萬金等〉。
- 〈廖瑞發等叛亂〉。
- 〈鍾興福等案〉。
- 〈蕭塗基等叛亂〉。

二、史料彙編

- 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臺北：國史館，2020年。
- 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二冊。臺北：國史館，2020年。

三、辭典

- 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年。

四、口述歷史、回憶錄

- 李石城，《鹿窟風雲》。臺中：白象文化，2017年。
-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獨家出版社，1995年。
- 侯坤宏訪談，蔡說麗、林建廷記錄，〈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口述史〉，收入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03年。

張炎憲訪問，高淑媛記錄，〈方賀田訪問記錄〉，收入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文化中心，1998年。

五、報紙

《公論報》，臺北，1948年。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林正義，〈比較杜魯門與布希總統危機處理政策——以韓戰及波斯灣戰爭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5期（1994年4月）。

林正義，〈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研究》，第19卷第4期（1989年12月）。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0卷第1期（2009年3月）。

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第37期（1994年1月）。

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人間思想》，第20期（2019年10月）。

薛月順，〈導言〉，收入薛月順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一冊。臺北：國史館，2020年。

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臺北：臺灣人民出版社，2010年。

